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93年，大約是在我高二的時候，我在花蓮高中的圖書館，一座看起來現代化，但是內部空間陳設卻不夠人性化的圖書館，找到一本書—楊牧的《山風海雨》。楊牧是故鄉花蓮有名的詩人、散文家，也是畢業於花蓮中學，只是在當時很弔詭的事情是在校內大概十之八九的學生並不知道有這個人，其原因一方面是可以歸諸當時花中的學生普遍接受外界訊息的管道有限，連帶地視野必會受到影響，此外也跟當年校方重理工成就的治校政策有莫大的關係，所以普遍地花蓮中學的學弟們都不知道有這樣一位在花蓮以外「有名」的學長。

高二時的圖書館還沒有電腦化的檢索設備，所以平日要看什麼書還要親自到館內走一趟搜索。就這樣我在館內那些不算排得整齊的書架上，偶然瞥見這本書，因為之前已經在報紙上看過楊牧的名字，也知道他跟花蓮還有學校的關係，就不遲疑地借了這本書。

現在還能記得，在高二某一天看完這本書的晚上，心理實在地湧起某種莫名的感動，感動的原因是自己發現第一次如此地親近花蓮，感受到花蓮。因為我們家並不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是在我國一時才搬去的，距離從台北搬遷到花蓮也不過4年多，而且父母是宜蘭人，他們口中常常談論的故鄉事，其實都是關於宜蘭的事情，難免會令人覺得跟花蓮有所隔閡。因此當我第一

次讀到《山風海雨》這本書時，心中的感動是我終於藉由楊牧這本回憶性，帶有濃濃自傳味的散文，將自己連結上花蓮過去的歷史，也是藉由他的這本書我才終於可以知道平日父母無法述說，與鄰居談話也不會觸及的花蓮的點點滴滴。

或許在今日聽來，這樣的經驗帶有一些些的荒謬性，畢竟一般觀念裡對於個人故鄉的想法就是那種從小生長到大，最少到求學之前都一直居住的地方，因此故鄉透露著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意義。但是對我而言，這種普遍的意義是不能套用的，原因是我對於花蓮的過去根本就不熟悉，不過奇怪的是，可能是因為位置特殊的關係吧？面對外界時，卻往往都被視為花蓮人了，而且可能也是長久在各地搬遷的關係，父母或者說是整個家庭也早把花蓮視為最後的落腳地，想要作一個真正的花蓮人。也因此《山風海語》，在於我的意義是填補了對於花蓮過去認知上的空白，但並不是一種僅止於知道花蓮何日開始被空襲，何年發生大地震等知識的空白，而是更進一步地，經由楊牧對於過去回憶的描寫，我也似乎能感受到花蓮過去的氣味，溫度、聲音，以及當時人們生活上的恐懼、好奇、傷感等，填補了回憶的空白。可以說經由《山風海語》還有楊牧其他兩本同樣回憶性質的散文¹，讓我完成了作為一個花蓮人的必要條件，就是知道花蓮過去的記憶，同時也第一次真正認識到文學力量偉大的地方，認識到文學可以述說許多歷史書寫無法表達的層面。

認識到文學的重要性是形成我選擇這個題目的第一個原因，至於第二個原因則是我在1999年到2000年修習張瑞德老師的「現代中國的戰爭與社會」時，因為課堂上「戰爭與文化」、「戰爭與歷史記憶」這兩個主題，讓我認識到所謂戰爭不只有一般想像中的物質上、肉體上與空間上殺戮與破壞而已，實際上戰爭帶來的精神上與文化上的影響更是深遠，甚至可以綿延幾代不

¹ 其他兩本散文分別是《方向歸零》（1991）和《昔我往矣》（1997），現在合稱為《奇萊前書》（2003）。

覺。而且恰好我又在《山風海語》上讀到這樣一段文字：

大約就在B二九開始飛臨日本上空，並且轟炸日本軍人的家鄉的時候，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美國飛機也出現在台灣島上，造成可怖的空襲。但幾乎所有的轟炸和掃射都是偶發性的，而且都集中在北部與西部較大的城鎮，也許根本沒有來到過花蓮。海潮依然平靜地拍打著山嶺俯瞰下的小城，結著一條又一條永恆的白紗帶，在麗日下，風雨中，不停地湧來，升起又落下。然而不久以後，我們終於聽到美國飛機掠過花蓮的消息；它在港口附近投了幾顆炸彈，並且以機關槍襲擊這裡僅有的幾間大工廠。空襲來了，終於，戰火波及這默默無聞的小城了²。

飛機空襲花蓮的次數越來越多，那大概是冬天當美軍逐漸逼近菲律賓群島的時候。等到麥克阿瑟將軍把日本人悉數驅逐出呂宋以後，美軍卻決定跳過台灣和澎湖，直接撲向硫磺島，而且僅對我們的家鄉展開密集的空襲。³

這一路上太平靜了，我坐在車廂裡看著農舍和田地，看著河流和山林，看電線桿一根一根向後退，完全沒有戰爭年代的恐懼與不安。可是等我們進入山地住定後，有一天我聽到大人在傳說，晚我們幾天離開花蓮的一班列車在木瓜溪附近曾遭到美軍飛機的攻擊。誰知飛機很快轉了一個彎又回來了，並且猛烈向野地裡避難者開火，殺死了很多人，然後才掠過木瓜溪上空，向海外飛去。多年後我上中學的班上，有一個男同學曾經對我說，戰爭時代他和母親正好就搭上了這班不祥的列車；他自己倖免於難，然而他母親卻在那血腥的掃射裡被機關鎗打死了。他是我的好友，我記得他的父親一生未曾再娶。⁴

在楊牧緩慢的文字敘述帶引下，我彷彿真能感受到在多年後才察覺到戰爭帶

² 楊牧，《山風海雨》（台北：洪範出版社，1987），頁27。

³ 楊牧，《山風海雨》，頁28。

⁴ 楊牧，《山風海雨》，頁33-34。

來的影響的心情，而且更覺得一絲絲震撼的哀愁，畢竟曾有一段時間的感受是戰爭就像那些轟隆隆而過的B29一樣，雖然每天經過，但終究是天外之物，「完全沒有戰爭年代的恐懼與不安」。

因此，這樣一種文學與戰爭連結，同時也是牽涉到歷史記憶的連結，是我讓最先想要以「戰爭」、「文學」與「歷史記憶」作為研究計畫题目的原因，此外，也是出於當時一個單純的想法，就是對大多數被認為缺少戰爭經驗的台灣人（本省人）而言⁵，我想要知道他們是如何是想像「戰爭」的圖像。當然，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戰爭經驗，最近的來說，例如在二次大戰時被日本徵召前往東南亞、中國戰場當軍伕的台灣人就不計其數，另外還有被徵召當護士，以致慰安婦的台灣人也是算一種戰爭經驗。或是像在二戰時期的武人總督統治、皇民化運動、糧食管制、言論管制都不能不說是與戰爭有關。像戰後來台的外省人本身在大陸即已經最少經歷了八年的對日抗戰，加上後來的國共內戰，有關戰爭的經驗自然又比一般之前居住在台灣的人來的豐富。而像後來的八二三砲戰等，則可以說得上是目前居住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最為共通的一個戰爭經驗了。

由此看來的話，台灣人的戰爭經驗應該是很豐富才對，不過，我們別忘

⁵ 研究二次大戰時，日本在台灣軍事動員體系的林繼文，在1999年由思與言雜誌社舉辦的「『台灣政治共同體』對談會」上說：「把外來者不安全感擴大來講其實就是戰爭經驗。假如從日據時期以來分成幾類人來看，如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本省人、外省人等等姑且這樣區分的話，有真正戰爭經驗的是日本人與外省人。日本人的戰爭經驗來自直接面對大陸的戰場，他直接expose在戰爭的動員與氣氛中，甚至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這很早就開始了。但台灣人是透過日本人去想像他自己的戰爭經驗，當然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也有很多到中國戰場去，但若是1940年走在台灣街上隨機地抓一個人，他的戰爭經驗非常可能是想像來的，他可能過的是歌舞昇平的日子。戰後也很有趣，台灣被塑造成復興基地，但這是外來統治者在塑造的。如果你今天問年紀大一點的外省人，他們的戰爭經驗是非常具體的、也非常血淋淋的，可能就是跟著他成長的。但是你如果問六、七十歲的本省老先生的戰爭經驗，有一部份當然是他自己的，但大部分只是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氣氛而已」。

見思與言雜誌社，台灣政治共同體座談會，《思與言》，37：03（台北，1999：09），頁19-20。

了間接的戰爭經驗終究與直接的不同。在二次大戰期間，台灣島唯一真正算得上受到戰火的波及是「空襲」，真正嚴格定義下的戰爭，就如中國戰場上的軍隊對軍隊間的廝殺，並未在台灣本島出現⁶。所以對台灣人而言，或許是真正地感受到了戰爭，但是感覺是沒有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日本人等強烈，諸如像猶太人的被屠殺，波蘭人的受納粹鎮壓與法國人的被佔領經驗等，都是造成這種感覺差異的關鍵。

可是，沒有豐富的戰爭經驗，並不表示台灣人就不會想像戰爭，只是在我們的主要歷史記憶中沒有被突顯出來而已。只是諷刺的是，之前提到的幾個在二次大戰時受創甚深的國家，在戰後的現在，早已藉由國際的安全機制脫離了戰爭的威脅。可是台灣卻反而因為國共內戰的問題、冷戰陰影的持續與外交策略的失誤，繼續飽受戰爭的威脅，而台海在西方人眼中也成了國際上的重要衝突點。在這樣情勢下，台灣人自然不無時無刻繼續感受到戰爭的存在，例如1994年時出版的《一九九五閏八月》，就可以造成台灣人民某種程度心態上的恐慌，在1996年時總統大選時，發生的中國對台海的導彈試射事件，更是讓此間生活的人們趕到戰爭的圖像似乎是越來越清晰，這就像名歌手伍佰在《空襲警報》中的一句歌詞一樣：「不知道飛機何時還會再來？」。

戰爭雖然在主流記憶的表層中沒有被凸顯，並不表示就完全沒有影響力，只不過隱身伏藏為記憶的潛流，繼續影響著人們對於外在世界的思考，外在秩序的認識。確實，相對於西方人對歷代戰爭經驗重視而開展出來的豐富研究成果與論述，在台灣類似的研究成果就顯得貧乏了。有關這方面可以

⁶ 這當然要感謝1945年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最後採用陸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主張美軍先奪回菲律賓，以控制西南太平洋地區的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戰略，沒有採用海軍總司令尼米茲（Chester Nimitz）主張的「跳島戰略」。所謂「跳島戰略」是尼米茲認為應該先攻下台灣，因為奪下台灣之後，日軍與日本本土、中國大陸占領區以及南洋一帶的補給線與聯絡網，都將被切斷，台灣並可成為盟軍北打中國大陸和南攻菲律賓的樞紐。兩位總司令曾為了該採行的誰的策略吵的不可開交，最後白宮透過參謀本部採用了麥克阿瑟「菲律賓第一」的戰略。詳細內容請參閱林博文，〈老尼米茲，中途島戰役名留青史〉，《中時電子報》，2002年1月16日。

從國外的「戰爭研究」(War Studies)或是軍事史的研究社群眾人數多看出。

而且，一般而言，在西方有關戰爭或是軍事的研究，其深度、廣度也確實比較多面向，這也是我在「現代中國的戰爭與社會」課堂上時所得知的，所以我選定了這個主題為碩士論文的題目，希望藉由這方面的研究，能夠解答我心中的某些疑惑。

二、研究背景

(一) 題目說明

本論文的題目「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基本上是環繞著三個主題—戰爭、歷史和文學回憶⁷書寫與相關外在環境的影響，以及包括在這之中一個潛在的主題—「族群的認同」為處理核心而展開的。在這個三個主題中，「戰爭」被我視為是一個集合的「圖像」(scheme)，也就是說戰爭這樣一個主題在本篇論文裡面被當作是呈現記憶中某一區塊的集合點。因為在「歷史記憶」方面，從理論上來講，每個人的歷史記憶絕對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但是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是會有彼此的交集處，而這些交集處所以能產生，實際上正是有賴於每個人的記憶中必然都會有與他

⁷ 本論文題目原為「戰爭、記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在口試審查期間，承蒙吳文星教授指正認為本論文處理的範圍並未包含戰前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日記」，所以題目寫作「記憶」恐有疏漏。由於本論文處理的史料範圍主要以戰後追述二次大戰經驗的書寫為主，加以時間因素，無法在論文付印前加入吳文星教授建議的史料。因此在指導教授張瑞德老師的建議下，將本論文題目改為「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用「回憶」(remembrance)取代「記憶」(memory)，以更符合論文中的史料皆是戰後追述書寫戰爭經驗的性質。

不過，本論文在以下行文間仍然使用「歷史記憶」或是「記憶」等詞彙，主要原因是目前學界在研究不論個人對於過往回憶的書寫或是社會對於過去的記載等，還是多以「記憶」作為表述這兩種現象的通稱，所以本論文仍將繼續使用歷史記憶或記憶，用來表述各種有關回憶的書寫或研究成果。

人相同的一些圖像存在，像戰爭即是其中一個。此外，如戰爭這樣歷史記憶中的圖像，是有一些反映的途徑被記載在現實的生活中，像文學作品的書寫必然也是反映戰爭圖像的一途，因此，選擇文學作品，特別是有關於戰爭印象或是想像的部分作文本分析，則是瞭解戰爭圖像是如何連結歷史記憶，或是歷史記憶如何反映戰爭圖像的一個管道。

以上的三個主題之間關係的說明，其實是為之下一個潛在核心主題的背景說明，就是每個人的戰爭圖像其實是隨著個人歷史經驗的不同而具有異質性，但這是從小範圍來講。若是從大範圍來觀察的話，每個人的歷史經驗在如何不同，終究還是會尋出與他人之間的交集點，譬如說每個人在二次大戰中的親身經歷或許不同，但是一旦歸結到戰爭這個圖像下，交換經驗時，卻又可以形成某種共通的歷史記憶了。或許這樣的歷史記憶，其中有確確實實的經驗之談在裡面，但是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創造的部分，不過，是真實或是創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拿這樣的歷史記憶來去認識外在的世界，建構外在世界的秩序，並且也以此來區分他者與我的疆界。特別是對像台灣這樣的移民社會而言，過去往往也是構成認同的一環，人們會藉由因為有相同的歷史記憶而趨近。不過，趨近也並非單一的群體自我主觀的認定，而是會有兩個，或是三個以上的群體彼此之間互動後，才有可能產生各自大範圍歷史記憶下的認同，這方面的看法原則是接近人類學家提出的「歷史情境論」(historical circumstantialism)。⁸

因此以下的研究背景說明方面，我將要從戰爭與歷史經驗方面，而接著之後歷史經驗形成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方面，及最後文學作品與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這三個方向來說明現今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

⁸ 歷史情境論是以人類學家Frederik Barth為代表。這派學者認為族群界線的創造與維持來自族群的互動，經常就是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變動的結果，而且往往牽涉到權力關係。見葉春榮，〈從文化的發展看台灣族群的融合〉，收在鄧憲卿編，《台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9），頁239-240。

(二) 有關戰爭經驗的研究

目前有關二次大戰的戰爭經驗研究，最直接涉及的領域應該就是戰時的軍事動員了。在這方面，有林繼文的專書《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李國生的碩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楊雅慧的《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江智浩的《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和鄭麗玲的《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

林繼文的《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主要是從戰時經濟情勢與體制變動的角度談1930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台灣的經濟、軍事、政治和社會動員體系。依照林繼文的看法，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所實行的戰爭動員政策，「乃是因應193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大恐慌後日本的海外擴張政策而來的。這種擴張政策，不僅表現在其對於中國大陸的武力侵略上，更具有形成一種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意圖，所以動員政策的範圍不僅包含了軍事性的物資徵用，更廣及社會經濟結構的重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重編反應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可以時期來看，例如在「決戰階段」（1942-1945），因為動員政策上強化統制經濟的關係，所以需要大規模的人力動員，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就是形成接收期通貨膨脹的問題以及之後軍人、軍夫復原問題。也因為在此階段，台灣被日本殖民政府劃入戰場，「使動員政策的重點由生產能量的擴充突然轉變為對既存資源的最大程度徵用」。所以許多殖民地人民被大規模的軍力動員和勞力徵用，產生「脫位」（dislocation）現象，也就是突然失去原來的社會角色或是從既有的階級地位被驅離，這也是後來動員體系破產的主因。此外，由於日本海外戰線不斷地延長，最終導致動員體系的負擔超越了生產能量，也發生瓦解現

象。⁹

有別於林繼文偏重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二戰軍事動員的原因，李國生的《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則是從日本政府實際對於台灣人民的動員過程做探討。李著首先從法令上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和組織上由台灣總督府到皇民奉公會，最終到保甲制度的軍事人力動員開始，然後詳細說明在戰爭初期軍夫、軍農夫到軍屬的動員過程，戰爭中期的台灣軍人正式動員，其中包括從志願兵到徵兵的轉變和少年兵的出現，最後說明對台籍慰安婦的動員。依據李國生的看法，在日本殖民政府這一連串的軍事人力動員過程中，也配合了實質上政策的改變，例如在1944年徵兵制實行後，次年，1945年日本眾議院即通過了台灣可以實施有限制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案，以及修正貴族院令，接著廢止了「保甲制度」，改以內地的「鄰保制度」取代，可以說是戰爭局勢加速了台灣的「內地化」。此外，在前一年，1943年，日本在台灣實施義務教育，目的是為了「皇民化」，因為在教育過程中可進行「國家認同」及國語理解的目標¹⁰。這些戰時政策的實施，對於日後台灣人的心靈產生重大影響。

除了一般以男性為主的軍事動員外，楊雅慧的《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則是探討在戰時軍事動員下，台灣漢族婦女的處境。在日本政府的強制性動員和皇民化精神改造下，台灣婦女在戰時的軍事動員角色仍然不出傳統性別分工，即是台灣婦女必須負擔起後方守護家庭的重責，在戰局政策的需要下被強化。再者，皇民化運動使得女性失去了身體的自主權，因為她們的身體擁有者是皇國，凡是被冠上「皇」字的事物，國家皆取得無比的正當性，因此楊著認為「殖民政府在台灣針對女性實施的勞務動員，事實上並沒有將女性帶入一個比較多元

⁹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245-249。

¹⁰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220-226。

性的職業領域」¹¹，只是凸顯與台灣殖民地性格相符合的軍事人力動員。

江智浩的《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則是分析日治時期戰時軍事動員的組織，江著認為「從中日全面戰爭展開的1937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伴隨著臺灣戰時角色轉變的背景因素，使得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和皇民奉公會在組織的角色定位，內部結構及運作活動上有所差異」。就戰時動員組織的發展脈絡而言，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可說是日本殖民政府企圖集結非官方勢力的起始平台，並且整體動員在皇民奉公會成立後整個戰時動員組織發展成熟。另外從日本當局在殖民統治上所運用的中介團體的發展脈絡來看，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扮演的是從戰前社會教化團體到皇民奉公會的過渡性角色。並且從臺灣社會精英參與動員組織和負責相關職務的情況來看，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延續了1935年後殖民行政體系中，中央—地方／舊—新台籍精英的分佈情形，而皇民奉公會則進一步將1935年地方選舉殖民當局所吸納的台籍社會精英容納至中央層級組織¹²。

最後鄭麗玲的《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則是從治安(保甲、警察)、社會教化(學校)配合下的軍事動員(役場)來看戰時台灣社會的運作和轉變，例如原本是與保甲制度密切，以維護治安為主的壯丁團，如何在戰時體制需要下，展開配合總督府的軍事動員。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出，現階段對於軍事動員的研究，主要仍是從上而下，注重是政府如何引導民間基層的人力、物力投入戰場的情況，但是由於近來由下而上的歷史研究流行，因此這些研究者在觀察上層如何動用下層資源之時，也會撥出同樣的空間來探討軍事動員對於被動員的人與所處的社會

¹¹ 楊雅慧，《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日本殖民政府的教化與動員為分析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92-96。

¹² 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159-163。

有何影響。有關這方面影響的研究，其實是有關於另一個領域「社會軍事化」的研究了。例如在鄭麗玲的一篇文章裡即有提到日治時期台灣人被日本統治者徵召的兵制改變情形，以及這種兵制改變下，統治者藉由宣傳帶給台灣人的壓力（像台灣男人不當兵，即是「非國民」），包括到戰爭後期，徵兵與皇民化運動結合下，從教育方面結合，鼓勵殖民地人民去「為國打拼」。¹³此外，除了下層民眾被徵召做兵外，即使在上層文學界中的文人，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戰爭帶來的社會動員壓力，和官方對於文學創作活動的統制。在柳書琴的《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是以《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分別代表的一日一台文人集團，在戰時仍不免雙雙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壓制，要求配合軍事宣傳活動，顯示出二次戰時，日本對台灣社會軍事動員之徹底。¹⁴

除了以上研究戰爭經驗的專書與碩士論文外，近幾年來許多關心原台籍日本兵人士所做的口述訪問也是本論文關心的重點，目前有周婉窈《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鄭麗玲《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和《國共戰爭下的悲劇：臺灣軍人回憶錄》、陳銘城、張國權《台灣兵影像故事：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蔡慧玉、吳玲青《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以及潘國正《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等。關於這些書的內容將會在第三章有關討論到過去台灣實質參戰者的經驗時，一併介紹。

（三）有關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研究

歷史記憶有一個親近的學術名詞就是—「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不論稱作歷史記憶或是集體記憶，都是國內近幾年來流行於探討

¹³ 鄭麗玲，〈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軍事動員〉，《台灣風物》，44：3（台北，1994：04），頁51-89。

¹⁴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124-171。

族群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方法。集體記憶若是依照創立人摩里斯 阿伯瓦克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的說法, 是屬於一種社會建構論範疇的行為, 也就是:

個人的記憶是社會建構的, 並且是社會現行的、共同的關懷引發人們對過去的回憶。 (因此) Halbwachs的社會建構論的觀點, 意味著集體記憶不斷變動的。社會權力的分配和流行的意識型態的變化, 會改變人們對過去的理解。從這個觀點來看, 記憶是不可靠的, 是過去在心靈上再現的圖像, 而非實質歷史的復活。¹⁵

因此, 集體記憶 (或歷史記憶) 就這層次來說, 是屬於被發明的 (invented)。

國內有關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研究方面, 在1996年, 王明珂就已經用量化的方式探討在台灣社會中「誰在回憶、誰被回憶, 以及哪些主題被回憶」, 並且包括「回憶者」和「被回憶者」的性別、省籍與事業經歷背景的統計, 以得出是哪些人在台灣社會中的記憶被呈現出來, 哪些人被遺忘。最重要的是, 王明珂提到了, 不論回憶者還是被回憶者, 都是男性多於女性, 非台籍多於台籍人士, 反映在回憶的文本上 (自傳、傳記), 呈現出的情形是不論具有軍事背景的受訪者的抗戰、剿共經歷, 還是非軍事背景者的抗戰與逃難生活經歷, 因為常被提及, 所以透過許多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或是媒體、教科書, 成為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社會記憶」, 或者也是一種「集體受難記憶」。即使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親身經歷這些過去。¹⁶

此種集體社會中集體受難的記憶轉變為社會中族群認同的疆界時, 反映的就是戰後台灣「外省人」身份認同的塑造了。柴雅珍的碩士論文 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 (1945-1987), 在外省人的認同形成中提到, 戰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 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形下到來, 因此在

¹⁵ 蕭阿勤, 集體記憶理論的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 《思與言》, 35: 1 (台北, 1997: 03), 頁247-296。

¹⁶ 王明珂, 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 《思與言》, 34: 3 (台北, 1996: 09), 頁147-184。

沒有經濟來源，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情形下，就容易傾向「與語言容易溝通，生活習慣接近，又具有『共同歷史記憶』的人接近」。¹⁷而且來台的外省籍人員中，以眷村為例的話，其中的軍隊文化仍然很濃厚，況且居住其中人員所經歷的歷史，又與政府在戰後所宣傳的意識型態歷史相吻合，這自然對於形成眷村裡外省人的歷史記憶有極大影響。¹⁸

由不同集體記憶所發展出來的個別族群認同，特別是其中相互對立性最高的外省／本省認同，在解嚴後，更是順著政治情勢與經濟關係的改變，轉化成了「國族認同」。例如王甫昌提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之所以造成外省人在社會文化上的相對剝奪感原因，是外省人覺得他們的集體經驗與歷史記憶似乎受到忽視，這忽視的原因即是來自於包括過去長輩抗戰口述的故事與日本殖民統治相比，本省人似乎不視為重要的歷史記憶，也在這樣脈絡下，過去根植於抗戰經驗故事的中華民族認同也似乎受到忽視了。¹⁹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所謂的「外省人」或是「本省人」都只是相對性的概念，絕非「絕對性」的概念，概念的分法與界定會隨著時間與社會變遷而改變。

（四）有關文學作品與歷史記憶、族群認同的研究

從1991年朱天心在《中國時報》發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以來，有關眷村人的研究即在學院內興起，一時間大家都急於探索誰是眷村人？眷村人的認同是什麼？眷村人在島內的定位是什麼？有沒有眷村人的歷史？如果有的話，眷村人要如何在台灣定義自己的過去，面對自己的現在以及如何展

¹⁷ 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1945-1987）〉（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82-83。

¹⁸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頁94-108。

¹⁹ 王甫昌，〈光復後台灣族群意識的形成〉，收在鄧憲卿編，《台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頁213-236。

望自己的未來？在這重重的疑問下，學院內出現了不少試圖以借助文學文本的分析來釐清眷村人的歷史與認同的研究。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讓眷村人急於探索自己認同的濫觴是朱天心的一篇短篇小說，所以回歸探索自我認同的最佳途徑也是要透過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這反映了文學文本在現代社會塑造認同的力量，並不會小於一般認定的教科書、歷史劇等其他型式文本。這也說明了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在幫助個人想像歷史情境，進一步塑造認同上有類似的功能。

目前國內專題探討眷村文學與眷村人認同的研究成果，在論文方面，按時間排序分別有吳忻怡的「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以下簡稱「多重現實」建構）、蔡淑華的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為對象（以下簡稱眷村小說研究）、曾意晶的族裔女作家文本中的空間經驗—以李昂、朱天心、利格拉樂、阿、利玉芳為例、周淑嬪的蘇偉貞小說研究—以女性觀照與眷村題材為主、吳雅慧的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和曾燕瑀的朱天心小說研究。

前兩部作品是以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為中心，將焦點放在80年代成名的外省第二代眷村作家的作品上，藉由眷村作家對於眷村生活環境的描寫，眷村生活史的追憶（抑或創造），探索眷村中的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的意識建構、形成和對於國族的想像。這之中，吳忻怡的「多重現實」建構是引用舒茲的「多重現實」理論，而且「以眷村文學為文本（text），並透過對文本的解析來凝結出眷村以及眷村族群的特色」後，進一步瞭解眷村的形成環境，居住其中眷村人的生活由眷村文學中對於外省人自我意識的描繪，看出眷村對於外省人的象徵意義（在這方面，作者指出要借用班納迪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把眷村文學視為一「想像共同體」建立的媒介。透過對該族群菁英份子〔眷村文學作者〕的論述分析，關照着眷村族群的集體意識與其可能的建構過程。），以及眷村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文本在促進外省人

自我族群意識長成上的互動²⁰。

有別於吳忻怡的專注於文本的想像共同體，蔡淑華的《眷村小說研究》探討的範圍則又擴大多了。在這本論文裡，談到除了外在層面—眷村的形成與文化環境，時間、空間意識外，也談到了內在層面—眷村人的童年記憶、性別意識、國家想像以致族群自覺。此外，在探討眷村的歷史記憶形成上，作者這樣寫道：

眷村人 即在於其格外深刻的戰爭記憶，以及被賦與某種神聖光環的復國聖戰使命。這種身世背景的特殊性，在長期受部隊訓練與軍事化觀念的灌輸下，從營區延伸到了眷村，漸次被馴化為眷村人情感與思維方式的一部份，對其價值觀、國家觀、人生觀與美學觀等層面，有極深遠的薰染陶冶。²¹

而在此同時，為了建構一套能夠支持其政權與歷史根源的論述策略，與象徵符號。國民黨政府亦運用其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長時期推動了一系列「中國化」政策。更進而在台灣社會塑造了一集體性的「歷史記憶」，聯繫起個人與群體、當下情境與歷史脈絡、台灣與中國間的主從血脈關係，指向一共同的起源。²²

由這段敘述看來，作者認為眷村中外省族群意識出現的主要內在因素即是深刻的戰爭記憶，而這戰爭記憶在國民黨政府的長期以來的中國化政策之下，因為彼此間具有相當高的親近性，所以被吸收了，並且內化成眷村人，然後外擴至外省人的族群認同和演變成國族認同。不過在處理時，只是將戰爭當作背景敘述而，並沒有將之當作主體的對象研究，而且文本分析的內容也只僅限於代表外省族群的眷村文學而已，尚未處理到有關本省族群的文學

²⁰ 吳忻怡，「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理論社會學組碩士論文，1996），頁7。

²¹ 蔡淑華，《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為對象》（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20-21。

²² 蔡淑華，《眷村小說研究—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為對象》，頁24-25。

文本中對於戰爭的敘述分析，而這將是本論文之後討論的重點。

不同於前兩本論文是以普遍的外省籍第二代作家作品為分析對象，後四本論文則是以研究單一外省籍第二代作家為主。例如曾意晶藉由分析朱天心文學作品中的眷村經驗，認為朱天心的文學作品反映了她個人的意識型態，而這所謂的意識型態指的是「在父輩反共復國氛圍下成長的眷村第二代，對於保家衛國的軍人有崇拜的情結」。受到此崇拜情節影響，早期朱天心的作品或多或少可以讀到族群優越意識的呈現，但是到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由於朱天心有意地要重新檢視，也是要重新建構自己的眷村經驗，所以原本的優越感消失了，反而是體認到眷村的邊緣性（可能是因為時代變遷的影響），讓《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眾多沒有名字本省人圖像，從「又黑又土的本省男孩」變成了沈穩可靠的「心儀伴侶」²³。此外，不論在朱天心早期或是晚期的作品裡，她所描寫的眷村人物不見得特意要點出人物的身份或背景，只要看人物的名字、姓氏、稱謂，讀者就可以很輕易地瞭解所要描寫的究竟是那一族群。再以作品中角色來說的話，從早期作品開始即可發現朱天心所描寫的人物大都以環繞在身邊的眷村人物為主，這些人物的特性，在第一代的話不外以鄉愁和戰爭記憶為敘述中心，第二代的話則就是以童年、成長、愛情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朱天心的文學文本中致力於建立眷村人（獲說是外省籍第二代）的共同人物圖像，讓眷村人在談及眷村時，不會流於只有空間經驗上的相同而已，更是可以透過這些共同人物圖像的敘述，有了相同的歷史記憶和屬於眷村人的特性。

朱天心意圖打造眷村人物共同圖像的文學文本，在台灣從來就不是沒有人質疑過，加上解嚴後朱天心的政治立場，更是讓不少人振振有詞質疑她的文學立場。吳雅慧的《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正是試圖為這個棘手的問題提供一個解釋。在吳雅慧看來，朱天心的眷村情懷實際上是映射出一種焦

²³ 曾意晶，〈族裔女作家文本中的空間經驗—以李昂、朱天心、利格拉樂、阿、利玉芳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9），頁46-48。

慮。此種焦慮是因為隨著台灣政經結構的大變動後，文化主位挪移後的文化失落而來。所以讓她干犯眾怒，「積極以另一種聲音介入台灣文學，企圖將自己生命的真實存在寫入台灣文學的時空座標上²⁴」。朱天心的另一種聲音在台灣文學的場域中引起一種流俗的論爭，就如同政治場域一樣，質疑者會問她的文學究竟算不算是「台灣文學」？對此，曾燕瑀的《朱天心小說研究》則以「朱天心像是一個執守自己過去記憶的老靈魂²⁵」角度出發，認為她的批判姿態與深沈焦慮，若是審視創作者個人的話，可以說是書寫上的喃喃自語，也是一種想要透過書寫的方式讓自己的記憶不會被遺忘，讓自己的時間延遲的方式。所以說朱天心的創作一方面是保留自己的時代，一方面也是抗拒外在的時代，從而在這兩種時代的辯證，把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串連在這一條文學之路上。最後這結論大概也可以說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可以引起那些不同階層的老靈魂們共鳴的地方。

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引發了對於外省籍第二代的認同關注後，或許是受到衝擊，在學院中也出現了研究本省籍作家的作品與歷史、族群認同的論文。例如：王淑雯的《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濤沙》為焦點分析》、余昭玟的《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王慧芬的《臺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賴松輝的《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歷史語言》等論文，皆是以大河小說為分析對象，探索文學文本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選擇以歷史意味濃厚大河小說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是具有在台灣文學史脈絡下的特殊意義，依據楊照的說法，戰後台灣的大河小說其實是具有填補學校教育中有關台灣史一片空白的功能，因為國民黨政府特意忽略清領、日治時期歷史的教育政策下，像鍾肇政、李喬等作家在寫作長篇小說時，更是自覺有必要透過小說來傳達歷史知識的必

²⁴ 吳雅慧，〈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73-177。

²⁵ 曾燕瑀，〈朱天心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147-150。

要。所以即使大河小說為了肩負「教育了一整代新覺醒本土主義者的重要教科書」的責任，以致於有損小說整體的美學風格²⁶，但是作為歷史分析使用的文學文本卻是相當適當的。尤其大部分的大河小說都具有明確的追尋歷史定位意念，就以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來說，其中主角陸志龍從戰前到戰後自我認同轉折的經過，就是除了《亞細亞孤兒》外，適合用來研究台灣人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波動的題材。此外，大河小說也具有明確的台灣史分期意識，例如《台灣人三部曲》和《寒夜三部曲》都是以從清領、日治到光復的分期方式書寫台灣史，這之中所要挑戰的是國民黨戰後對日治時期歷史的特意忽略所造成的斷層。所以藉由觀察大河小說中的台灣史到解嚴後教科書中敘述內容的轉變，也約略可以瞭解台灣人歷史認同的變化。

在大河小說的研究之外，文學研究方面最近也有探討戰後台灣小說中呈現的戰爭經驗的論文 - 莊嘉玲的《台灣小說殖民地戰爭經驗之研究》。這本論文是採用戰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分類方式討論每一代本省籍作家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戰爭經驗，並且在與歷史文本的記載對比下，強調呈現經驗的真實性。從這三代小說家呈現的經驗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戰後台灣（本省籍）三代的小說家在描繪戰爭經驗上顯露出了一些差異，大體上可以說是越到後面作家所寫的戰爭經驗小說，戰爭的重要性被放的越大，在文本敘述中的角色越發顯著，而且也認為對台灣人心靈的影響越大。反之即是與戰爭相去不遠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在他們以二戰為背景的小說中，有時候我們卻很難感受到戰爭在文本敘述中的重量，甚至可以說在小說裡，愛情、友情、種族間的掙扎，往往更是這些描繪日治時期生活文學文本的特色。關於這值得玩味的一點，我們將留在第五章中討論。

另外，近年談論文學與意識型態的著作，如蕭阿勤的著作 - 《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中對於文學

²⁶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頁104-105。

／文學史的被詮釋意義會隨著不同時期的外在社會意識（主要指政治意識）變動而有所不同，也對本論文在寫作上，觀察文學作品與社會意識型態的互動上，深具啟發性，例如書中的主要論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對於台灣本省籍作家表現在民族主義面向的衝擊就是用「台灣意識」取代之前的「中國意識」，成為創作、詮釋文學作品的標準²⁷，就與本論文第二章內容相關。

從以上回顧看來，我們可知在台灣，二次大戰時期的歷史記憶確實對本地的住民有相當的重要性，而且對二次大戰前與戰後前來定居的移民之間關於戰爭的歷史記憶詮釋，也有相當差異度存在。這差異包括對於戰爭中敵人的定位不同，戰爭在49年前生活經驗裡比重的不同，戰後對戰爭時期記憶與國家意識型態的不同，以及由戰後已形成的歷史記憶對於國族認同的不同等。同時這些差異也反應在日後看待歷史的角度和文學文本敘述的角度，而且這些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以及差異所造成的各種文化上、認同上疆界的出現，和反映在文學文本中的意像，都將會是本論文處理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略論

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將會採取文本分析的方式，即是透過對於歷史文本（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和文學文本（小說）的解讀，討論其中反映出的戰爭圖像對歷史記憶形成的影響，以及歷史記憶形成之後影響族群意識建構的層面，最後再述及族群意識又如何反映在文學文本的敘述中。

就如同文學批評中的新歷史主義 - 始作俑者史蒂芬 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所說新歷史主義旨在考察與「文學文本世界相對的社會存在和文學文本內的社會存在」²⁸。因此，本論文將分為以下幾個步驟來進

²⁷ A-chin Hsia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87-116.

²⁸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8），頁29。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與傳統文學批評，甚至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最大不同處，在於「新歷史主義不同意

行，第一是先作文學史的回顧，探討戰爭經驗文學在整個台灣文學史中佔有何種地位？雖然說台灣文學史目前還在建構階段，而且依照政治意識型態的取向，也可說有統獨之分，但是在統獨分野之中，卻都有一個共通的文學史發展觀點，即是認為台灣的文學史的主要發展架構是寫實主義，然後再由寫實主義的觀點去詮釋各文學文本是屬於鄉土文學或是中國文學。因此，本論文將處理文學史中有關戰爭經驗的文學究竟是被歸屬何種位置，以及如此歸屬的原因。

在處理過文學史中的戰爭經驗文學位置後，緊接著要處理有實際參戰經驗小說家的作品。關於這部份，我要從戰後台灣重要的文學作家葉石濤談起，談他在文學作品中處理戰爭的方式，特別是他那唯美、浪漫帶有一絲南國風情的書寫方式，戰爭在他的作品中真的成了時代劇（喜劇、悲劇、諷刺劇等）的背景。之後，我在談鍾肇政。跟葉石濤相比，鍾肇政關於戰時經驗的文學作品就顯的冷酷、平靜，特別是在戰爭的襯托下，鍾肇政筆下的人物顯的不安，也必須面對更多的欺壓與不平等待遇，即使談到愛情，鍾肇政文本筆下人物與葉石濤的差別也顯現在於結局的不同，鍾的結局通常是悲劇，而葉則多是喜劇，不然就是帶有淡淡哀愁的喜劇。

除了作家的作品外，接續的部分是分析目前各種台籍原日本兵的訪談錄、回憶錄。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這些訪談錄、回憶錄中強調的往往是台籍原日本兵有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合理權力。這合理權力奠基於兩點，一是日本政府在戰時於法律上確實虧欠台籍日本兵，例如軍郵問題，戰時薪餉問題以及

將歷史看做僅僅是文學的『背景』或是『反映對象』，他們認為『文學』與形成文學的『背景』或『反映對象』之間是一種互動關係，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係。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和文學都是一種『認識領域』（episteme），是『不同意見和興趣交鋒的場所』。

因此，新歷史主義者明確主張，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歷史的能動力量（a shaping power），在從事文學批評時，便把文學看成是歷史現實與意識型態的結合部，不僅希望從中看到實際歷史事件如何被意識型態吸收理解，既定的意識型態如控制和把握著這一認識過程，而且更加希望看到文學文本如何參與形成現行的意識型態這一逆向過程」。（頁26-29）

戰後對於台籍日本兵與日籍日本兵的賠償差距問題；二是從二次大戰中台籍日本兵為日本政府賣命參戰（不論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感上來看，戰後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兵的賠償過少，不符合戰前日本政府的政治承諾，因此希望「一視同仁」，比照日本人的標準。因此在一視同仁的訴求下，回憶的重點放在強調戰爭的可怕，台灣人在戰爭中的悲慘遭遇等上面。

分析過訪談錄、回憶錄的戰爭經驗之後，在第三部份要處理的是戰後有關戰爭經驗的文學作品。在戰後的台灣文學創作脈絡中，有關戰爭經驗的文學書寫並不居於被有意識地創作的主流地位，而且回顧書寫戰爭經驗文學的所謂戰後第一代作家，他們的作品原先設定的主題大都不是以戰爭經驗為主體，可能大多是想要書寫的是青春時代的回憶或是日治時代的生活風情等。只是以近期來講的話，檢視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卻成為文學批評中的主要聲音，或許這聲音的出現實質上是反映了近來文學界對認同問題上的重視而已。

為什麼文學界在處理認同的問題上會擴大到戰爭經驗，或說是意識到戰爭經驗的存在，這其實也跟解嚴後文學界有一股重新追尋或建構外省人意義的思想風潮存在有關，例如發展眷村文學的批評，探詢眷村文學的構成等。這一股追尋外省人意義的文學風潮，在我看來也同時影響了其他非外省族群對於過去構成本省外省族群認同分野的定義，就以前面戰後第一代作家的作品與現在作家的差別為例，我的閱讀過程中發現，文本敘述裡對於族群差異的認定有逐漸從第一代的強調種族本質走向經驗的傾向，也就是說以前是喜歡強調族群的差異是在意識層面，現在則喜歡強調是在歷史層面。

因此，在論文最後一部份，我就以陳映真的 *忠孝公園* 來作為這種文學書寫轉變的例證。在 *忠孝公園* 中，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到陳映真用一位外省人一馬正濤與一位本省人－林標的戰爭經驗作為對比的模式，鋪陳整個故事的進行。當然在這個故事中，馬正濤與林標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日本的經驗，他們都曾經於二戰時在日本的麾下做事，只不過兩個人的身份大不同，馬正濤是日本扶持下滿洲國的軍官，而林標只是被派到南洋去的軍伕而已。

無法得知作者如此安排的用意是否有意於對照戰後台灣特殊的族群權力位置關係，因為在故事中，不停地提到馬正濤對於林標一口不標準日語的不滿，雖然說林標一身日本海軍服的裝扮，曾經勾起他主動上前與之用日語寒暄。換句話說，同樣擁有戰爭經驗，甚至會說同樣的語言，事實上並無法讓馬正濤與林標更接近，反而是更疏遠，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很類似近來興起探討本省人與外省人族群意識的起源是戰爭經驗不同的大小論述？

暫且不管所謂本省人、外省人族群意識的不同是否在於戰爭經驗，作家陳映真已經藉由他的敘事功力，先替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也明白地講了答案，這明確地反應出文學家總是歷史學家在搜尋歷史答案上跑得更遠、更快的事實。但是我仍然必須說，參照葉石濤、鍾肇政、鍾理和、龍瑛宗等戰後第一代文學家的戰時經驗作品，是看不到如陳映真這樣的鋪陳敘事手法，因此我只能說文學批評家試圖想從文學作品中搜尋不同的戰爭經驗是不同族群認同的方法，在現階段來講還是不恰當的。